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之入學問題與族群關係*

王耀德**

摘 要

日治時期，臺灣人欲提升社會階層地位，其重要途徑之一就是接受更高等的教育。然而，在殖民教育體制之下，總督府當局本乎種族歧視、差別待遇之原則，建立臺日族群之間不相對等的教育結構，限制並壓抑臺灣人升學就學，同時維護日本人教育權利一向是殖民教育的本質。臺籍學生必須面對層層的入學競爭考驗，通過益趨狹窄的升學關卡，方能獲致向上流動之機會。

族群不對等的教育結構係透過入學機制，達成排擠臺灣人、保障日本人之目的。而入學機制亦藉由人為操控之臺人入學比率限制規定，建構臺籍學生難以突破克服的一道升學窄門。本文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為中心，探討日治時期臺籍學生入學窄門在歷史上形成之過程，並解析入學機制所蘊含的要素；同時，針對因少數臺人就學而衍生之校園文化，考察其族群意識與人際關係之具體樣貌。

關鍵詞：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入學機制、族群關係

* 本文部分初稿內容曾宣讀於「台湾社会の変容と口述歴史：思い出が紡ぎ出す歴史を探る」國際研討會（日本：東京女子大學，2008年7月4日至6日），會中承蒙評論人弘谷多喜夫教授、植野弘子教授，以及與會先進惠賜諸多寶貴意見，謹此申致謝忱。另外，對於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提供校史檔案資料，以及本刊編委會和兩位匿名審查學者惠予指導斧正，特此一併致謝。本研究為2008-2011年度日本文部科學省科學研究費補助金「台湾人の口述歴史の採集分析に基づく日本統治から戦後への台湾社会の轉換に関する研究」（基盤研究A：海外學術調查，課題番号20251005）成果之一。

**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來稿日期：2009年4月3日；通過刊登：2009年7月2日。

- 一、前言
 - 二、殖民體制下的專門教育
 - 三、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的形成
 - 四、臺籍學生的入學窄門
 - 五、校園中的族群意識與人際關係
 - 六、結論
-

一、前言

日治時期的臺灣殖民教育體制，臺灣籍學生完成初等教育後的升學管道異常狹窄，入學中等以上各級學校極為不易，臺人備受種族歧視與差別待遇，已是眾所皆知之事實。能夠擠進中等學校窄門，進而升學進入專門學校，甚至大學等高等教育機關就讀，可謂是臺籍菁英中的菁英。然而，此等升學之路在歷史上是如何鋪設形成？係透過何種入學機制及操縱手段來建構臺籍學生的入學窄門？同時，因少數臺人就學而衍生之校園文化，其族群意識與人際關係之具體情形為何？至今較少有相關的研究論述，這也是本文欲深入探討之重點。

創立於 1931 年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¹ 即為今日國立成功大學之前身，在 1943 年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工學部（工學院）以前，可算是全臺工業教育的最高學府，也是唯一工科高等教育機關。就日治時期的臺灣歷史而言，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立，不僅象徵由農業臺灣邁向工業臺灣重要之里程碑，也意味殖民地在配

¹ 日治時期創校正式名稱為「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雖然 1944 年 3 月 31 日依勅令第 250 號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改校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南工業專門學校」，然而此日治末期的校名未及 2 年旋即由戰後的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而結束，歷史較為短暫，故本文仍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代表日治時期的該校，同時將府立之「臺灣總督府」略除。另外，戰前一般雖以「臺南高工」簡稱，唯與現今通稱的「臺南高工」（創建於 1941 年 4 月，原名「臺南州立臺南工業學校」，今為「國立臺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易生混淆，因此除原書原文引用外，本文不使用「臺南高工」之校名簡稱用詞，特此說明。

合工業化和南進國策推動下，職業教育領域的擴充與提升，對於臺灣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深具特殊的時空背景意涵。同時，從殖民教育的發展脈絡觀之，與其他專門教育機關或改制或裁併之校史相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屬相對穩定中維持獨立個體發展，因此對於解析臺灣人入學問題及在校族群關係，實為極佳之討論對象。

基於此，本文擬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為中心，藉由口述歷史訪談、² 時人回憶紀錄等資料之爬梳整理，並考察文獻檔案史料相互檢證，試圖探究日治時期臺籍學生入學和在學的具體面貌，期盼有助於理解殖民體制下臺灣高等專門教育的實態。

有關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史的檔案文獻，戰前曾留下一部日文手抄本《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可視為最珍貴之參考依據。該手稿採編年紀要體例，記載自 1927 年 10 月 3 日創校緣由、迄至 1945 年 10 月 24 日陳儀行政長官來臺到任為止的學校大記事，從筆跡和內文來看，推斷應為逐年或以若干年彙整形式，且經手不同人士編撰而成，因此整體上稍欠一貫性。

此外，該校尚有每二年發行 1 本《學校一覽》以及不定期刊物《龍舌蘭》，前者除擇要擷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之史略外，也詳載學則細則、關係法規，以及教職員與學生（含入學、在學、畢業就職）名錄等資料；而後者則由校友會學藝部編輯出版，主要刊登師生投稿和資訊交流等方面的相關文章，兩者皆具有文獻史料之價值。然而遺憾的是，目前所知此兩種校刊各僅發行 5 冊後即未再續刊，³ 因此欲理解日治末期，尤其戰爭時期該校的實際情況，猶需有賴口述歷史或當事人自述的回顧紀錄。

戰後，成功大學積極致力於校史的編纂工作，唯初期仍處於黨國教育體制的氛圍，尚且瀰漫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幾部校史的編印，簡要概述或近乎漠視地

² 本文中所採用的訪談紀錄，其主要受訪對象有林麗清（1918~）、王振華（1929~2008）等 2 人，其引用內容分別於 2009 年 3 月 21 日及 22 日，經受訪者本人或家屬確認並同意刊登。

³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臺南：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計發行昭和七年度（1932）、同九年度（1934）、十一年度（1936）、十三年度（1938）、十五年度（1940）。《龍舌蘭》（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學藝部）共出版「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 年 7 月）、「第 1 號」（1934 年 12 月）、「第 2 號」（1935 年 12 月）、「第 3 號」（1937 年 3 月）、「創立十周年記念號」（1941 年 9 月）。

排除了戰前 15 年的歷史，⁴ 迨至 1990 年代始將成大校史回歸追溯至日治時期之創建階段。⁵

1991 年該校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建校六十週年紀念》，⁶ 摘納並中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的戰前內容且增加戰後歷史陳述，同年發行《成大六十年》紀念特刊，⁷ 而創校初設的科系，嗣後亦先後編印系史紀錄刊物。⁸ 繼之於 2001 年成大出版 70 年新校史《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⁹ 同年 11 月並舉辦「成功的道路：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上述這些校系刊物，不僅收錄多位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代臺籍校友師長的懷舊感言和追憶文章，同時也將校史論述推上學術殿堂，對於本研究提供了甚多頗富意義的徵考素材與理論依據。

基本上，戰前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日本人仍居主導地位，考察日籍師生之意象自不能忽略。戰後返國的日籍校友教員，在日本籌組校友會組織「鳳木會」且刊行會誌，¹⁰ 其中不乏蒐羅集結了會員緬懷過往的回想文章，參考應用此些資料，將更有助於解明並重構該校的史實。

在先行研究方面，上述的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集中，與本文相關之論述有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以及所澤潤的〈戰時体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国立成功大学の基盤形成の一側面〉等三篇論文，¹¹ 針對學校之成立背景、學生入學與畢業就職

⁴ 如：臺灣省立工學院編，《臺灣省立工學院概況》（臺南：臺灣省立工學院，1955）；呂興昌編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1946-197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76）；國立成功大學四十年專輯小組主編，《成大四十年：回顧與前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86）等。

⁵ 詳見王健文，〈前世今生：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2），頁 204-206。

⁶ 石萬壽主纂，《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建校六十週年紀念》（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1）。

⁷ 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1991）。

⁸ 如：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1994）；謝爾昌編，《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史：成大機械系六十年史（1931-199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1997）；謝爾昌編，《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史：成大機械系七十年史（1931-200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2003）。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2001）。

¹⁰ 以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名義出版者有：《鳳木会會報》、《鳳木会名簿》、《台南高等工業学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81）、《鳳木会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横浜：開校 6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1991）等。

¹¹ 請參見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頁 229-244；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與臺灣工業化〉，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

等，3位學者均作了廣泛的分析與探討。其中，在創校經緯或設立學科之背景部分，林孟欣和高淑媛分別從殖民教育發展史、臺灣經濟社會脈絡，提出精闢的見解，對於本文有相當大的啟發，但有關入學問題與校園族群關係之探究，則較少申論著墨。另外，所澤潤從中等教育與專門教育之供需互動關係中，以數據分析和回顧紀錄，梳理了戰時體制下臺人的入學限制問題，提供本研究諸多啟示，唯對於整體入學機制的結構性問題，較缺乏進一步的討論。

本文將在前述之研究基礎和問題意識上，擬先從歷史角度回顧審視殖民體制下專門教育之演變，其次，闡述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的形成過程，再透過口述歷史訪談與時人回憶紀錄等資料，剖析入學機制所蘊含之要素，進而考察校園中師生之間的族群意識與人際互動關係，以瞭解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籍學生入學及在學之實際樣貌。

二、殖民體制下的專門教育

十九世紀末葉以降，日本國內伴隨著資本主義急遽發展，推動職業教育制度成為刻不容緩的政策課題。1893年制訂實業補習學校規程，隔年復訂定徒弟學校規程，並通過實業教育費國庫補助法以為財政資助之保障。另外，尋常中學校亦導入工業、農業、商業等實業科；同時公布高等學校令，將大學預備科性質的高等中學校改為也實施專門教育之高等學校，欲藉此加強培植實業人才。嗣後，經歷甲午戰爭的勝利，加速激發了日本資本主義朝帝國主義化轉移，因應產業革命之展開，各類官立實業專門學校相繼成立，並且於1899年和1903年先後頒訂實業學校令與專門學校令，確立了中等教育以上階段有別於普通教育的技職教育學校系統，複線型教育體制於焉建構形成。¹²

1895年成為日本帝國殖民地的臺灣，初期日本並未即刻將國內教育相關法令制度全般移植島內施行，針對臺灣人有系統的各級學制，包括實業教育、專門教

《成功的道路》，頁245-259；所澤潤，〈戰時體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国立成功大学の基盤形成の一側面〉，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頁261-285。

¹² 川合章、安川寿之輔、森川輝紀、川口幸宏合著，《日本現代教育史》（東京：新日本出版社，1984），頁64-66。另外，王耀德，〈教育制度〉，收於張隆義主編，《日本》（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1996），頁330。

育，一直要等到 1919 年才粗具完備。基本上，日本在臺的教育政策，本乎種族歧視、差別待遇之原則，建立臺日族群之間不相對等的教育體制，限制並壓抑臺灣人向上流動；同時保障及維護日本人自身教育權利，一向是殖民教育的本質。治臺之初，總督府尚未確立一套根本的施政方針，對於臺灣人的教育設施十分不足，各種教育機關也缺乏有系統的整合，實際上無法稱之為教育制度。¹³ 大體而言，順應現實需要，採臨機應變方法之漸進主義、消極主義，亦即後藤新平所主張的「教育無方針主義」，乃是早期殖民教育政策的基調。¹⁴

此時草創階段的臺灣人職業教育，並無完善的法規及學制，大致僅止於實施應急式、試辦性的實業技能教育，以培養臺籍初級技術人員。在政府部門相繼開辦農事試驗場和糖業、工業等各類講習所，招收公學校畢業生。在學校方面，國語學校先後增設補習科以及鐵道科、電信科、農業科等，之後擴大成立實業部；而公學校亦添設多種職業選修科目，並設置二年制的實業科。另外，有鑑於臺灣環境衛生條件欠佳，殖民當局於 1899 年創設修業 5 年的總督府醫學校，以培育臺籍醫療人才。在上述的各種教育機構中，醫學校與國語學校為當時臺灣人的最高學府，唯只有醫學校勉強稱得上高等教育機關。¹⁵

另一方面，在臺日人的中等以上職業教育，隨著旅臺內地人漸增，為滿足其子弟升學需求，總督府分別在 1917 年、1918 年設立總督府商業學校和工業學校，均依照日本國內實業學校令，招收尋常小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之日籍學生，修業年限為預科 2 年、本科 3 年，共計 5 年的正統實業教育。此外，1918 年總督府醫學校增設醫學專門部，同樣亦根據內地之專門學校令，專收中學校畢業的日籍學生，修業年限 4 年，而該醫學專門部之成立，臺灣自此才真正產生具有嚴謹意義的高等專門教育機構。¹⁶

由上可知，日治初期的實業專門教育，相對於日本人就讀正規之各級學校，臺灣人接受的教育不僅體系紛雜，且內容程度低落。誠如矢內原忠雄下列所言，鮮明陳述了殖民統治者初期對臺灣人的教育，甚至包括職業教育抱持刻意漠視或

¹³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修，《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東京：龍吟社，1941），第 11 卷，頁 742；佐藤源治，《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1943），頁 120。

¹⁴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27），頁 115、120-130。

¹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8），頁 87。

¹⁶ 李園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2005），頁 256。

抑制之偏頗心態：

綜觀以上變遷，除領臺之初對於統治上最實用的醫師養成外，迨至大正八年為止，完全沒有專門教育機關，實業學校也缺乏，針對本島人的中等教育極不完備。……領臺後的二十五年間，統治的精力大都集中專注於經濟，對教育並不重視。國語教育和醫學，可說是統治臺灣在實用上所能夠允許的教育全部。通常被稱為殖民地教育基礎的技術教育，連在臺灣也被忽視。蓋其必要的技術家可由內地供給之故。¹⁷

學者指出，總督府的政策意圖，乃在於讓完成初等教育、離開公學校的臺人子弟返回務農或經商，或者於新式工業中成為半熟練的技術工人，決策者盡其所能阻止臺灣人產生更高等之教育、較優越社會地位和更佳就業機會的需求。因此，唯有少數的臺灣人經由教師及醫師兩個主要的安全瓣，得以順利尋求向上流動。¹⁸

迨至 1918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民主自由思想、民族自決思潮瀰漫全球，加上臺人民智漸開與民族意識覺醒，總督府面對海內外局勢丕變，遂調整治臺方針。1919 年頒佈「臺灣教育令」，正式建立針對臺灣人為對象的整體教育制度，具體架構相互聯繫配合的各級學制。臺灣教育令中明列普通教育、實業教育、專門教育及師範教育四項，臺灣人的專門教育至此才確立其制度上之地位，也開啟了臺灣人接受有系統專門教育的途徑。依據臺灣教育令第 22 條規定，專門教育「以教授高等學術技藝為目的，並重視德性之涵養」。

基本上，臺灣教育令的施行仍依循種族隔離的雙軌制，分別根據本令及日本內地法令，嚴格區分適用臺灣人和日本人就讀不同的學校教育機構。時任臺灣總督府參事官鼓包美，說明採取臺日相異教育系統之理由，略謂：臺灣人剛歸屬日本不久，沐浴皇化時日尚淺，在國語（日語）學習上仍有諸多困難所致。¹⁹ 在專門教育方面，專收臺籍學生有總督府醫學校改制而成的醫學專門學校，以及在臺

¹⁷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156。

¹⁸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77.

¹⁹ 鼓包美，〈臺灣教育令要旨（抄錄）〉，收於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 383。

北新設的農林專門學校和在臺南成立的商業專門學校等三校，入學資格為公學校畢業，修業年限分預科 3 年（醫專 4 年）、本科 3 年（醫專 4 年）；而日本人則進入醫學專門學校附設之醫學專門部，以及在臺北新創立的高等商業學校二校，招收中學校畢業之日籍學生，修業年限 3 年（醫專部 4 年）。兩者系統彼此之間，無論在入學資格、修業年限與教育程度內容等，均存在著極大的差異，臺灣人就讀之學校不僅水平低於日本同級學校，且和日本人的教育機構無法銜接。

1922 年配合內地延長主義，貫徹日臺融合的同化教育理念，進行修正臺灣教育令（新臺灣教育令）。中等以上教育機關形式上取消種族隔離和差別待遇政策，實施日臺共學制度，且依日本國內法令以單軌制趨於一體，將臺灣教育制度整合成能與日本內地接軌之體系。就專門教育部分而言，依日本國內專門學校令，升格改制原先臺灣人就讀學校之位階與日本相同，並先後發展成為計有四年制的臺北醫學專門學校，以及三年制的臺北高等農林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26 年新設的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和 1931 年成立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等五校，²⁰ 一律招收中等學校畢業生。至於前期專收臺灣人的商業專門學校，維持至 1927 年裁撤後官有財產移交新設的臺南高等商業學校。

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新臺灣教育令施行後的 1920 年代，以臺南為中心之專門教育機關出現兩度廢立的局面。亦即廢除商業專門學校後又創立臺南高等商業學校，繼之因決議成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再將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廢校。對於如此的政策轉換，若從社會角度觀察臺南民情反應與總督府之間的妥協，亦可略見端倪。

如上述所言，商業專門學校乃依據 1919 年臺灣教育令而設，當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為配合適用日本內地學制，且同質性的商業專門學校二校（另一所為臺北的高等商業學校）無並存之需要，遂決定予以廢校，待 1927 年末屆學生畢業前，繼續以舊制運作校務。²¹ 隨後由於臺南市民要求以及總督府當局也

²⁰ 實際上尚有一所 1931 年成立的「私立臺北女子高等學院」，屬女子高等教育機關，唯法制上列為各種學校類之私立教育機構。之後，1944 年又新設「私立女子專門學校」，承接利用自動解散之前者學院的校舍。詳見洪郁如，〈女子高等教育的植民地的展開：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学院を中心に〉，收於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会拡張と社会的相克》（京都：昭和堂，2008），頁 84-113。

²¹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 533。另外，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1939），頁 943。

深感有其必要，於是 1926 年在臺南又新設入學資格、修業年限與臺北高商相同的高等商業學校，並接收商業專門學校所有校產。²²

雖然後藤文夫總務長官在 1926 年 9 月 27 日，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建校典禮上說明「有鑑於本島實情及其地理、人文環境，本校有迫切設立之必要。臺南係本島古都，亦為往昔華南、南洋貿易通商之要衝，校址擇定此處，絕非偶然」，²³ 強調該校在臺南設立之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事實上臺南高等商業學校的成立幾經波折，²⁴ 論者亦曰：在臺灣原本就沒有設置二所高等商業學校之必要，成立臺南高商只不過是廢除商業專門學校之後的一種權宜措施。²⁵ 因此，當 1928 年 7 月總督府根據去年 10 月第五回及第六回兩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之討論與答申建議，²⁶ 提出設立高等工業學校意見時，即以當時「臺灣已有高等商業學校二校，輿論相當強烈地表示實在太多，無此需要」之理由，乃決定將其中之一的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廢校，另新設一所高等工業學校。在此同時，臺南州政府為爭取在地設校，以收購臺南市土地捐贈國庫方式，積極向總督府運作示意。²⁷

川村竹治針對採取此項政策就明確表示：

島內高等商業學校二校，似乎在人才消化上有困難，故將其中之一變更為高等工業學校。此舉在農本主義的臺灣，得以進一步謀求工業發展，不只島內工業可以自給，亦可試圖在華南、南洋地區活躍，這是對帝國臺灣所期待的重大使命。……將高商變更為高工一事雖屬極為細微之事，而且臺南高商創校以來沒有經過多少歲月，尚未有畢業生就變更，多少讓世人震驚，但總之，這是發展工業的豫備計畫。²⁸

²² 吉野秀公，《臺灣教育史》，頁 470。

²³ 〈南支南洋に用意されたる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廿七日開校式を舉ぐ〉，《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 9 月 28 日，第 5 版；〈臺南高等商業學校開校式に於ける後藤總務長官の訓示〉，《臺灣時報》1926 年 10 月號，頁 1。

²⁴ 〈臺南高商官制公布〉，《臺灣時報》1926 年 9 月號，頁 19。

²⁵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 949。

²⁶ 有關兩次總督府評議會之研議內容，參見〈第五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1 月號，頁 4-5；〈第六回臺灣總督府評議會〉，《臺灣時報》1927 年 12 月號，頁 16-27。

²⁷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 1-2。另外，參見若槻道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 年 6 月號，頁 1-2。

²⁸ 川村竹治，《臺灣の一年》（東京：時事研究會，1930），頁 41-42。

廢校已成定局的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在當時被形容為「產業工業化的犧牲」，高等工業學校營建新校舍費用之預算業已編列成立，而臺南高等商業學校方面則反遭刪除。臺南市民動向，或推動臺南高商存續運動、或對新設高等工業學校欣表贊同，亦皆有之。²⁹ 另外，在臺南高商校園內，面對前途未卜的校運，以及學生反對廢校運動和教職員生之焦慮，加藤正生校長益顯憂心忡忡。³⁰ 然而，在總督府既定方針的大勢所趨之下，加諸臺南市民滿足於以高等工業學校作為交換條件，對於臺南高商廢校問題頗形冷淡，學生反對廢校運動遂終歸沈寂。³¹ 雖然，嗣後文教局長石黑英彥特意南下蒞校訓示，學生態度突然轉而惡化，甚至引發軟硬兩派決裂，³² 但仍舊無法挽回廢校之命運。1929年3月，臺南高商正式裁撤並併入臺北高商改為臺南分教場，1930年3月俟臺南全部學生畢業後，分教場也隨之結束。³³

由是觀之，新臺灣教育令施行後的1920年代，臺南地區專門教育機關之廢立調整，在顯現政策混亂之餘，亦可發現輿論民情動向與當局之間的折衝協調。固然這些並非是決定政策之主要因素，如教育資源分配等亦需考量其中，但另一方面確實也多少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象和面貌。正如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校後，擔任臺南市尹的古澤勝之曾指出，當年臺南高商併入臺北高商之際，臺南市民失望之情表露無遺，因此當總督府提議成立高等工業學校，市民殷切期望在地設校，其開心見誠之懇求，終獲當局首肯。³⁴ 市民請願以及臺南地方政府極力爭取，不惜購地捐贈，向總督府釋出善意之舉措，亦是得以設校定案的助力。

²⁹ 〈『工業化』への戦士を作る，臺南高工具體化する，來年度に新營費を計上，臺南高商は廢校とす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4日，第2版。

³⁰ 〈臺南高商廢校的報道に對し興奮した加藤校長語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5日，第5版。

³¹ 〈臺南高商廢校問題：學生側は大勢と環境に鑑み，涙を吞んで反對運動を捨て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18日，第5版。

³² 〈石黑局長の廢校訓示と學生の態度〉；〈學生中に硬軟二派決裂，態度一致せず〉，兩則報導均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12月25日，第5版。

³³ 臺灣教育會編，《臺灣教育沿革誌》，頁949-950。此外，自臺南分教場畢業者1929年3月18日計有63名，1930年3月17日則共有58名，參見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30），昭和5年度，頁8。

³⁴ 古澤勝之於1934年3月15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開校祝賀式上的〈祝辭〉，載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1934年7月），頁15。

三、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的形成

從前述新舊臺灣教育令交替後，專門教育機關的整編和發展，可窺知專門教育領域的擴充與提升。一方面由過去的醫學、農林、商業，進而延伸至工業部門；另一方面在同一法令及共學制度下，形式上改善了臺灣島內的教育環境。但是，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後，在一視同仁、平等共學的亮麗口號背後，其實隱含著種種的矛盾與偏頗。表面上，從此臺灣人可以接受與日本人程度相同的中等以上教育，唯面對激烈的升學競爭，實際上反而是為迅速成長的在臺日人子弟提供更多教育機會。³⁵

換言之，1919年之臺灣教育令，在日臺分離的機制上建立分途就學之教育制度，雖然臺人就讀的學校程度低落，但畢竟是臺灣人專屬的獨立系統，臺籍學生於固定的自我圈域內就學、競爭，事實上反而形成一種保護傘，可以說在差別原則下臺人多少獲得些許的教育保障。然而，新臺灣教育令實施共學制後，形式上廢除了種族藩籬界限，但隨著教育體制內地化，無形中保護傘被撤除，臺灣人不僅沒有獲取更多新的教育機會和資源，甚至連過去擁有的也被日本人侵蝕剝奪，形成日人壟斷獨佔之局面，可說反而變成平等原則下保障日人優勢的支配地位。

從差別原則下的臺人保障轉變為平等原則下的日人保障，矢內原忠雄即直言此種徒具虛名的假平等。他指出 1919 年臺灣教育令中的專門教育機構係以臺灣人為本位，固然程度較低，但卻是獨立的教育機關。然而，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之後，中等以上各級學校因實施日臺共學制，使得臺灣學制悉數內地化，事實上這些學校均變成專為日本人所獨佔的教育機構。況且面對入學考試之競爭，臺灣人先天上的語言障礙，本來就處於不利地位，入學益加困難，加上除醫學專門學校和臺南高等商業學校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也在日本舉行入學考試，以招收內地學生。其結果，當然高等程度的各級學校就學名額均被日本人所獨佔。以教育制度同化之名，其實等於剝奪了臺灣人接受高等專門教育之機會。於是，矢內原批判道：

³⁵ 吳文星，《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頁 88-89。

大正十一年以前，藉降低臺灣人教育制度，使日本人取得主導性的支配地位；現在則是假借制度上平等之名，臺灣人亦可接受高等教育，實際上卻是多方限制，使日本人的支配地位更加得以確保。³⁶

新臺灣教育令固然提高了過去臺灣人本位學校之標準，提供更佳的就學機會給臺灣人，然而在沒有增加招生名額以容納日籍學生之情況下，臺灣人的教育機會不但沒有擴大，相反地，日本學生排擠原先臺灣人之名額，實際上減少了臺灣人在殖民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³⁷ 這種情形，由表一舉例高等農林學校、高等商業學校兩所歷年在校學生數之推移，立可判若分明。

表一：高等農林學校、高等商業學校歷年在校學生人數統計表

年度	高等農林學校				高等商業學校		
	臺灣人 (%)	日本人 (%)	其他 (%)	計 (100%)	臺灣人 (%)	日本人 (%)	計 (100%)
1919	22 (100.00)			22		39 (100.00)	39
1920	50 (100.00)			50	1 (1.25)	79 (98.75)	80
1921	113 (100.00)			113	1 (0.75)	132 (99.25)	133
1922	94 (81.03)	17 (14.66)	5 (4.31)	116		158 (100.00)	158
1923	92 (69.70)	35 (26.51)	5 (3.79)	132		168 (100.00)	168
1924	80 (51.61)	70 (45.16)	5 (3.23)	155	3 (1.52)	194 (98.48)	197
1925	71 (44.10)	90 (55.90)		161	9 (4.23)	204 (95.77)	213
1926	45 (28.85)	111 (71.15)		156	47 (16.20)	243 (83.80)	290
1927	8 (6.61)	113 (93.39)		121	64 (17.73)	297 (82.27)	361
1928	5 (5.05)	94 (94.95)		99	70 (17.16)	338 (82.84)	408
1929	4 (4.30)	89 (95.70)		93	36 (10.68)	301 (89.32)	337
1930	4 (4.08)	94 (95.92)		98	27 (9.57)	255 (90.43)	282
1931	4 (3.42)	113 (96.58)		117	20 (9.39)	193 (90.61)	213

資料來源：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該室，1946），頁1216-1217核算編製而成。年度僅列至1931年，下略。

說明：(1) 高等農林學校：1919年為臺灣總督府農林專門學校；1922年改稱臺灣總督府高等農林學校；1927年改名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農林學校；1928年併入臺北帝國大學成為附屬農林專門部；1942年脫離臺北帝國大學，恢復獨立設置並遷校臺中，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中高等農林學校；1943年改稱臺灣總督府臺中農林專門學校。

(2) 高等商業學校：1919年為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1926年改名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同年於臺南新設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商業學校；1929年裁撤臺南高等商業學校，併入臺北高等商業學校；1943年更名為臺灣總督府臺北經濟專門學校。

³⁶ 矢內原忠雄，《帝國主義下の台湾》，頁158-159。

³⁷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p. 101-102.

高等農林學校在 1919 年成立時是專為臺灣人設置的學校，在學生均是臺人子弟，但 1922 年實施共學制後，不論人數或比率，日籍學生開始逐年增加，臺籍學生則相對遞減，自 1925 年起日籍學生凌駕臺籍學生，臺灣人反而變成該校的極少數民族。

而 1919 年創校之高等商業學校原係日人本位的學校，臺人幾乎無緣就讀，縱然實施共學制後，依舊是日籍學生獨佔的天下。至於 1926 年臺籍學生略有增加，主要是該年度新設了臺南高等商業學校，臺北、臺南兩校人數合計的結果，³⁸但隨後因決定成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而將臺南高等商業學校裁併、廢除，臺人在學人數遂逐漸減少。

綜上得知，兩次臺灣教育令的頒訂與修正，實兼具兩面作用，一方面解決臺灣人的教育問題，並追求實現同化主義的理念；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教育制度，以確保在臺日人有利的受教機會與升學管道。從差別原則下的臺人保障過渡到平等原則下的日人保障，總督府操弄形式上或實質上的平等假象，建構形成族群不相對等的殖民教育結構。是故，在共學美名之下，表面上看似教育機會均等，然而透過升學競爭之試煉，結果導致語言劣勢的臺人無法公平享有教育資源，就學異常困難，但相對地卻保障在臺日人子弟擁有更多絕佳的教育機會。

基本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亦在此發展脈絡中創校成立，為完備在臺日人高等工業教育體系，提供其教育銜接的升學途徑，殖民當局之政策意圖是顯而易見。³⁹難怪當時臺人有識者對於該校之新設，抱持存疑與悲觀的態度，認為以過去既設大學、高校等之事實鐵證，臺灣人恐怕是無份享受此等教育，尤其首任校長若槻道隆在過去擔任視學官時代，對臺灣人的教育問題總持有異樣見解，因此對於臺人子弟能否入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不敢有所期待。⁴⁰

³⁸ 按年度以（臺籍學生+日籍學生）表示兩所高等商業學校在校學生人數：1926 年臺北（12+209）、臺南（35+34）；1927 年臺北（14+214）、臺南（50+83）；1928 年臺北（11+197）、臺南（59+141）。以上資料依據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 30 冊（1928 年，頁 85）、第 31 冊（1929 年，頁 85）、第 32 冊（1930 年，頁 89）。

³⁹ 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頁 235。

⁴⁰ 〈臺南高工的新設〉，《臺灣新民報》第 347 號，1931 年 1 月 17 日，第 2 版。

四、臺籍學生的入學窄門

1931年1月7日，依勅令第2號臺灣總督府諸學校官制中改正，設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同年1月15日以府令第1號公布學校規則，⁴¹並發佈人事令：校長若槻道隆，教授有藤田保太郎、長濱重麿、佐久間巖，以及書記4名，同時呈報招生事宜當日即刻獲准，⁴²此後1月15日成為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開校（建校）紀念日。

關於第一屆招生，募集訊息見諸《府報》及媒體，⁴³預計招收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應用化學科三科各30名，報名者相當踴躍，競爭激烈。⁴⁴3月16日至19日於本校及臺北高等商業學校兩地舉行入學考試，3月24日公告榜單，機械工學科錄取25名，電氣工學科25名、應用化學科22名，合計72人，並於4月10日辦理入學宣誓儀式，⁴⁵正式展開教務運作。

臺灣工業發展的前景，吸引無數有志青年投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如1934年進入電氣工學科的陳永祥回憶，當年之所以就讀高工，乃因日月潭正籌建大型發電廠之緣故。⁴⁶又據1940年入學電氣化學科的柚木武士回憶，因出生花蓮，目睹日本鋁業公司在花蓮設廠，於是立志報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⁴⁷根據1939年臺南一中、臺南二中⁴⁸畢業生升學意願調查，以日本人為主的臺南一中104名

⁴¹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150號，1931年1月15日，頁55-58。

⁴²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3-4。嗣後於1931年4月1日任命藤田保太郎為機械工學科長，長濱重麿為電氣工學科長，佐久間巖擔任應用化學科長，《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5。

⁴³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5-66；〈臺南高工生徒募集〉，《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1月17日，第7版。

⁴⁴ 〈臺南高工志願者二百五十名位か，入學試験は十六日から〉，《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3月5日，第2版。

⁴⁵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4-6。

⁴⁶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陳永祥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州」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487。

⁴⁷ 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頁227。

⁴⁸ 文中「臺南一中」係指日人就讀為主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一中學校，戰後成為臺南二中。另外，文中「臺南二中」係指臺人入學為主的臺南州立臺南第二中學校，戰後成為臺南一中。

畢業生當中，扣除 16 名直接就業者後，有意朝工科方面升學者達 33 人，其中報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有 31 人，比率甚高。而以臺灣人本位之臺南二中 91 名畢業生中，減掉 23 名直接就業不升學者之後，剩下 68 人大都依往例仍以醫科志向最多，計有 47 人，但第二順位則為工科的 11 人，其中投考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者 6 人、日本內地高工有 5 人。⁴⁹ 由此大致可瞭解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入學動機和在地中學生的升學意向，同時也反映在族群不對等結構中，臺籍學生面對入學競爭，以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歷屆錄取臺日人數不成比例之傳統，所作的無奈抉擇。

族群不對等的教育結構是透過入學機制，達成排擠臺灣人、保障日本人之目的。試從表二可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日籍學生的入學人數比例，除首屆各佔一半較為特殊外，⁵⁰ 其餘各年度均呈現懸殊的落差，若合計創校後的 12 年間，日籍學生共有 1050 人（81.84%）入學，而臺籍學生則只有 233 人（18.16%）。就錄取率觀之，大抵上臺籍學生低於日籍學生，1942 年甚至兩者相距近達 3 倍之多。

另外，從表二可發現，自第二屆招生起無論臺灣人或日本人，報考人數逐漸減少，但隨後日籍學生之入學人數及其比例次第攀升，錄取率也比首屆提高，就學機會益顯有利，其報考人數也漸趨增加。反觀臺籍學生方面，則出現報考人數和入學人數銳減之特殊現象，依據學者的研究指出，這不僅是因報考人數少而影響入學人數，實際上也因為臺灣人錄取人數偏低，導致連帶牽動以後臺人投考之意願，使報考人數漸次遞減，而產生互為循環的弔詭現象。⁵¹ 此即臺人入學希望渺茫背後的無奈心理，相對地亦顯示優秀臺籍學生通過嚴苛入學考驗的艱辛歷程。雖然 1940 年因新設電氣化學科，並增加機械工學科、電氣工學科招生名額而舉行兩次招生，臺日雙方報考人數、入學人數及錄取率均見大幅成長，唯這僅是單純表面上的數據，族群間入學人數比例之基本盤面依舊如昔，未獲改善。

⁴⁹ 〈巢立つ若人の行方：台南一中と同二中，工科、醫科への志望多し〉，《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9 年 3 月 8 日，第 5 版。

⁵⁰ 有關首屆招生錄取臺人日人各佔一半，確實原因未明，譬如後述趙承琛所言，認為是「自由、公平競爭的考試結果」。另外，機械工學科教師前田一夫，在回憶中略微提及該科首屆入學學生臺人比日人多〔按：臺籍 14 人、日籍 11 人〕，敘述藤田保太郎科長當時受到關切，唯詳情未交代清楚。參見前田一夫，〈回想〉，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72。

⁵¹ 所澤潤，〈戰時体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頁 264-265。

表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歷屆招生統計表

年度	人數、比例	臺灣人	日本人	合計	各科招生名額	考場地點
1931	報考人數	190.0	219.0	409.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高商
	入學人數	36.0	36.0	72.0		
	錄取率%	18.9	16.4	17.6		
	入學人數比%	50.0	50.0	100.0		
1932	報考人數	76.0	148.0	224.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
	入學人數	30.0	55.0	85.0		
	錄取率%	39.5	37.2	38.0		
	入學人數比%	35.3	64.7	100.0		
1933	報考人數	56.0	139.0	195.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
	入學人數	19.0	56.0	75.0		
	錄取率%	33.9	40.3	38.5		
	入學人數比%	25.3	74.7	100.0		
1934	報考人數	60.0	134.0	194.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
	入學人數	15.0	51.0	66.0		
	錄取率%	25.0	38.1	34.0		
	入學人數比%	22.7	77.3	100.0		
1935	報考人數	51.0	187.0	238.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第一師範
	入學人數	10.0	61.0	71.0		
	錄取率%	19.6	32.6	29.8		
	入學人數比%	14.1	85.9	100.0		
1936	報考人數	49.0	248.0	297.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一中
	入學人數	11.0	55.0	66.0		
	錄取率%	22.4	22.2	22.2		
	入學人數比%	16.7	83.3	100.0		
1937	報考人數	45.0	232.0	277.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一中
	入學人數	10.0	62.0	72.0		
	錄取率%	22.2	26.7	26.0		
	入學人數比%	13.9	86.1	100.0		
1938	報考人數	58.0	243.0	301.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一中
	入學人數	12.0	65.0	77.0		
	錄取率%	20.7	26.7	25.6		
	入學人數比%	15.6	84.4	100.0		
1939	報考人數	52.0	262.0	314.0	機械 30、電氣 30、應化 30， 計 90	本校、臺北一中
	入學人數	9.0	74.0	83.0		
	錄取率%	17.3	28.2	26.4		
	入學人數比%	10.8	89.2	100.0		
1940	報考人數	97.0	461.0	558.0	機械 80、電氣 80、應化 30、 電化 40，計 230	臺灣：本校、臺北一 中、臺北女子高 等學院 日本：福岡中學校、大 阪帝大工學部
	入學人數	32.0	183.0	215.0		
	錄取率%	33.0	39.7	38.5		
	入學人數比%	14.9	85.1	100.0		

1941	報考人數	83.0	864.0	947.0	機械 80、電氣 80、應化 30、 電化 40，計 230	臺灣：本校、臺北一中 日本：九州帝大工學部
	入學人數	22.0	162.0	184.0		
	錄取率%	26.5	18.8	19.4		
	入學人數比%	12.0	88.0	100.0		
1942	報考人數	117.0	279.0	396.0	機械 80、電氣 80、應化 30、 電化 40，計 230	本校、臺北一中
	入學人數	27.0	190.0	217.0		
	錄取率%	23.1	68.1	54.8		
	入學人數比%	12.4	87.6	100.0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頁 1244；《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各期《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 35-46 冊）》、《臺灣總督府府報》、《臺灣總督府官報》、《臺灣的教育》、《臺灣の學校教育》等。

說明：(1) 1940 年因增科及增加招生名額，舉行兩次招生，本表以合計並列說明。

(2) 錄取率%：入學人數／報考人數。

(3) 入學人數比%：各民族之入學人數／合計入學人數。

根據時人追憶，大都指出臺籍學生入學極為不易，人數鮮少，而日籍學生卻佔多數。⁵² 1939 年入學應用化學科的趙承琛敘述，臺灣人要考上本校甚難，以應用化學科為例，當期 23 人中只有 2 人是臺灣人，而全校三學科合計，臺籍學生也僅有 9 位，其中中學校全校第一名畢業考進來的就有 4 位。趙氏進一步說明首屆招生臺日人數各半，是自由、公平競爭的考試結果，但自第二屆之後總督府就開始干涉、施壓，以減少臺灣人接受高等教育之機會，此後臺人入學大約保持在 10% 左右。⁵³ 另外，1942 年同樣進入應用化學科的林麗清表示：

當時能考入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應化科的臺灣人大概只有 5、6 人，但這是較後期略有改善之人數，在此之前更少，甚至僅只 2、3 人而已，相對地日本學生則多達約 30 人。本校的入學考試很難，我那個年代，以南部地區而言，臺籍應考生許多來自臺南二中或長榮中學校的畢業生，其他中學校學生幾乎沒有勇氣報考，縱使有，也都是該校經選拔後的頂尖人物 1 人才敢推薦應試。⁵⁴

⁵² 如：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26；林耿清，〈五十餘年的回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01。

⁵³ 趙承琛，〈成功大學六十年的回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99。

⁵⁴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 年 5 月 30 日，未刊稿。林氏入學的

大體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入學考試困難、臺籍學生量少質佳，是一般普遍的印象記憶。然而形成這道臺人入學窄門，係透過何種機制、如何運作，若深入加以探究，應可明晰殖民教育所具有的侷限性。

首先，就若槻校長之治校教育理念而論，1937年入學電氣工學科的林苑明回憶說，若槻校長在開學典禮特別說明國家花費鉅資、家長支付高額學費來培育你們，但畢業後就業很困難，所以錄取人數少並非全然是差別待遇。⁵⁵ 可是，仔細推敲此言，誠屬片面之詞。若槻在擔任視學官時，針對臺灣教育就明示教育內地化雖有其必要性，唯以本島國語（日語）普及狀態尚未達到和內地相同之境界，因此在文化進步的路程上，採取差別待遇是不得已的措施。⁵⁶ 換言之，以臺灣人日語程度不佳之由而少錄取臺籍學生的差別待遇，若槻認為是文明發展上所允許的「不得已」政策。這點見解也就是前述臺人有識者對該校創設，抱持質疑、悲觀之原因。

其次，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入學考科早期訂有國語漢文，⁵⁷ 這是當時日本所有高等工業學校中僅見的罕例，據聞是因若槻出身文科〔按：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科〕而特別重視，且技術者也被要求撰寫報告文之故。⁵⁸ 到1933年該考科拆成國史與國語兩科，⁵⁹ 翌年國語加考作文，⁶⁰ 1940年後則變成只考國史。⁶¹ 但是，無論國語漢文、作文或關係日本歷史和國體觀念問題之國史考科的設定，加上口

1942年前後，南部地區臺籍男子主要就讀且已有畢業生的中等學校，有州立的臺南二中、嘉義中學校、高雄中學校、屏東中學校，以及私立的長榮中學校。雖然考生來源無從查考，但若根據《鳳木會名簿：1996年版》（千葉：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1996）及其他相關資料，1941年至1944年間入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之臺籍學生，出身上述學校可考者，分別為：臺南二中6人、嘉義中學校2人、高雄中學校3人、屏東中學校0人、長榮中學校7人，或許可作為參考數據。至於中等實業教育之工業學校，南部地區於1941年始設立州立臺南工業學校，因此當時尚未有畢業生報考。另外，私立長榮中學校於1939年6月正式獲得立案認可，1941年3月送出立案後的第一屆畢業生，可投考上級學校，參見張厚基總編輯，《長榮中學百年史》（臺南：私立長榮高級中學，1991），頁212-213、253。

⁵⁵ 林苑明，〈為母校創校六十週年紀念而作〉，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44。

⁵⁶ 若槻道隆，〈臺灣の教育に就て〉，《臺灣時報》1927年1月號，頁19-20。

⁵⁷ 按首届招生的考科內容及順序為：第一天體檢和口試；第二天上午數學、下午物理；第三天上午英語、下午化學；第四天上午國語漢文，參見〈臺南高工志願者二百五十名位か，入學試験は十六日から〉。此外，《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152號，1931年1月17日，頁66。

⁵⁸ 里見文義，〈凡愚のたわごと〉，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117。

⁵⁹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686號，1932年12月8日，頁28。

⁶⁰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1984號，1933年12月19日，頁61。

⁶¹ 《臺灣總督府府報》第3749號，1939年12月3日，頁8。

試需以日語應答，以及若槻之教育觀，對於語言劣勢的臺籍考生而言，無疑是增添考試合格的難度，形成一道高不可攀的牆垣，若非異常優秀者，否則實在難以跨越。

再則，如趙承琛所述來自總督府當局的施壓，亦即藉由行政干涉來壓抑臺人升學數量。臺灣人一般深信在殖民政策下，對待臺人有入學限制的不成文規定，⁶²一直為臺灣人所詬病。臺籍知識份子就明言，殖民當局極端限制臺人入學人數，並暗指准考證有日人奇數號、臺人偶數號之特意安排，明顯地，升學測驗非依成績而是按民族的差別來核定。⁶³ 1944 年入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首屆土木工學科的鄧凱雄指出，當年考入本科的臺籍學生只有 8 名，佔全科的二成，這比率是規定，無關乎考試成績如何，無法和日籍學生公平競爭。⁶⁴ 《臺灣新民報》即為文批評責難此類入學限制之政策，略謂：各級學校表面上根據考試來決定入學可否，但實際上在尚未實施考試前，已將臺籍學生的錄取人數限制在一定比例之下，甚至在 1、2 個月前已內定臺籍學生、內地學生分別各錄取幾名。所以，縱使是優異的天才也很難突破這層入學限制的關卡。⁶⁵

除人為操作之入學限制外，如表二所示，與其他部分高等專門學校相同，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於 1940、1941 兩年度在日本國內也設置考場辦理招生，藉此吸納內地日籍學生來臺就學，一方面彌補在臺日人子弟學力水準之不足；另一方面擴大日本人的教育機會及權利，以抑制臺灣人入學。⁶⁶ 因此，臺籍學生不僅面對在臺日人的競爭，同時亦須和內地日籍學生角逐，以致入學窄門更形狹隘。

上述情形不只是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放眼日治時期諸多臺灣高等教育機關，均存在著相同的臺人入學不公之問題。概觀分析可知，構成臺籍學生入學窄門約有以下四項要因：一、掌管學校主事者之教育理念，謹守並奉行總督府的殖民教

⁶² 如前述趙承琛所言，臺人入學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比例大約 10%。另外，1944 年入學應用化學科之葉來興表示，日治時期公立大學、專門學校臺人入學比例限定在 5%~15%。又，1944 年畢業於長榮中學校的張厚基也指出，臺籍學生投考大專學校，其錄取名額不得超過原定名額的十分之一。以上參見葉來興口述，高淑媛訪問記錄，〈1944 年入學台日籍學生比例風波〉，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頁 36；張厚基總編輯，《長榮中學百年史》，頁 271。

⁶³ 謝春木，《臺灣人は斯く觀る》（臺北：臺灣民報社，1930），頁 52-53。

⁶⁴ 鄧凱雄，〈治癒疾生吞海蟑螂，救同學問罪憲兵隊〉，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104。

⁶⁵ 〈臺灣人學生を苦める制限教育を撤廢せよ，當局の深甚な考慮を促す〉，《臺灣新民報》第 409 號，1932 年 4 月 2 日，第 14 版。

⁶⁶ 所澤潤，〈戰時体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頁 265。

育政策，加上校內教師族群結構，往往也主導影響錄取判定之結果；二、除國語漢文、作文及國史考科外，口試亦須以日語應答，毋庸贅言，語文是臺灣學生升學直接面臨的最大障礙；三、形式上的考試制度背後，卻隱藏著不容質疑、不可改變的臺人入學比率限制規定，且透過人為操縱，達到抑制臺人入學之目的；四、藉由內地招考方式，擴大日籍學生優勢的主導地位，以擠壓臺人入學機會。

事實上，臺人升學窄門或操控入學機制之現象，在中等教育階段即已普遍存在，⁶⁷ 學者亦指出當時臺籍學生的共同認知，就是中等學校的入學考試與知識能力或優秀表現無關，日本人的血統才是最大優勢。⁶⁸ 而且，縱使有幸能進入中等學校，日本人本位之學校比起以臺灣人為主的學校，師資普遍優良、設備亦較充實，因此也唯有這類學校之畢業生方有絕佳機會考入高等專門學校。⁶⁹

若再進一步深入探討，讓此窄門現象得以穩固並發揮效應，追究其因，又導源於初等教育機會與資源的不均等。眾所周知，無論學齡兒童就學率、教育經費分配、平均校數或學校設備，以及教員的質與量，公學校比小學校水平程度低落甚多，其結果自然造成臺籍學生升學上級學校產生差別，進而於一般社會生活上也失去平等之機會。⁷⁰ 況且，中等學校入學考試試題完全以小學校教科書為依據，口試亦使用日語，而各中等學校同樣也有臺人合格人數之限制，⁷¹ 因此在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下，能通過「試驗地獄」的臺籍學生無非皆是優秀人才。

要言之，自初等教育階段起，受制於國家限制性的教育政策，臺人的升學道路是愈趨狹窄難伸，越往上級學校爬升，其就學之門越是緊閉而困難重重，整體上形成一種相互連鎖效應的層層關卡。入學機制、限制臺籍學生入學人數比例雖是不成文規定，但深具難以撼動的絕對化性格，而且含有時間上之延續性，長期

⁶⁷ 汪知亭針對造成臺籍學生入學中等學校之窄門，歸納有下列四點原因：一、能考取中學者，多數是小學校或規模較具、師資優秀的公學校畢業生，而此類學校則非一般臺灣學童能進入就讀，在受教育的起步階段，臺灣人就已經處於不利之地位；二、中等學校入學考試，口試成績佔有相當份量，口試採用日語，臺籍學生自然無法與日本人相抗衡；三、各中等學校之錄取會議，其主持的校長乃至於參與之教員幾乎都是日本人，因此有利於日籍學生；四、日本人對於錄取新生有一項不成文規定，就是凡日本人所進的中等學校，臺籍學生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而臺灣人所進的中學，日本人則不受任何比率上的限制。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頁92。

⁶⁸ Tsurumi, E. Patricia,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p. 117.

⁶⁹ 汪知亭，《臺灣教育史料新編》，頁157。

⁷⁰ 〈社說：臺灣教育的機會不均等〉，《臺灣民報》第265號，1929年6月16日，第2版。

⁷¹ 李國會，《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頁664。

剝奪臺人在各級學校的受教學習權利；同時，因屬人為的操控運作，亦具有動態性的機能體制，而建立這道入學窄門之最終目的，不外乎就是壓制臺灣人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機會，從而確保鞏固日本人之殖民支配地位。

五、校園中的族群意識與人際關係

透過不對等結構的入學機制所形成的學生族群，其中處於相對少數的臺籍學生，在面對和人多勢眾之日籍學生同窗共硯、相處學習，到底產生了何種觀感？另外，對於當年傳道授業之教師留存何者印象？本節試圖藉由若干個案的回顧紀錄及口述歷史之考察，來瞭解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內師生的人際互動關係。

(一) 學生同儕間的族群意識

從表三歷年在校學生人數與比例，即明顯看出臺籍學生始終是孤立的弱勢集團，此種情形在殖民教育體制內原本不足為奇，唯現實的教育活動中，臺日學生之間呈現怎樣的迎拒關係和集體意識。1931年首屆入學機械工學科的葉萬發回憶，在校中皆與日人共學，當時臺灣人在各方面均受日本人不平等待遇及輕視，心中隱藏著不滿，所以無論在學業或體育方面都不肯認輸。⁷² 又，1943年進入電氣工學科就讀的許炳楠敘述，學校的學生宿舍都是分配給日本人，臺灣人則一律在外租屋。臺籍學生雖然少數，但相當團結，民族意識也濃厚；而且非常用功，成績出眾，個個名列前茅，絲毫不比日人遜色。⁷³ 有關學生宿舍的排除臺人規定，1943年入學機械工學科的日本人增田昌俊提及，在開學典禮當日遇見臺北工業學校臺籍同學、來自澎湖的洪瑞卿，在已提出住校申請卻校方毫無通知的情況下，扛著行李來校而苦於無處棲身投宿，深感訝異，畢竟在臺北工業學校並無此項排臺規定。⁷⁴

⁷² 葉萬發，〈走過烽火，樂在服務〉，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39。

⁷³ 許炳楠口述，劉秉恆整理，〈禮義廉恥與新速實簡〉，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53。

⁷⁴ 增田昌俊，〈昭和18年春の想出〉，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第54号》（横浜：該會，1999），頁13。

表三：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歷年在校師生人數統計表

年度	教員			學生		
	臺灣人 (%)	日本人 (%)	合計 (100%)	臺灣人 (%)	日本人 (%)	合計 (100%)
1931	1 (4.55)	21 (95.45)	22	36 (50.00)	36 (50.00)	72
1932	1 (3.33)	29 (96.67)	30	64 (41.56)	90 (58.44)	154
1933	1 (2.22)	44 (97.78)	45	79 (35.75)	142 (64.25)	221
1934	1 (2.08)	47 (97.92)	48	60 (27.27)	160 (72.73)	220
1935	5 (10.20)	44 (89.80)	49	41 (19.62)	168 (80.38)	209
1936	5 (10.64)	42 (89.36)	47	35 (17.33)	167 (82.67)	202
1937	4 (8.51)	43 (91.49)	47	29 (14.01)	178 (85.99)	207
1938	3 (6.82)	41 (93.18)	44	29 (13.81)	181 (86.19)	210
1939	4 (8.51)	43 (91.49)	47	27 (12.11)	196 (87.89)	223
1940	6 (11.54)	46 (88.46)	52	49 (13.84)	305 (86.16)	354
1941	6 (10.17)	53 (89.83)	59	51 (13.78)	319 (86.22)	370
1942	9 (11.39)	70 (88.61)	79	51 (12.44)	359 (87.56)	410
1943	6 (11.32)	47 (88.68)	53	68 (10.73)	566 (89.27)	634
1944	8 (14.81)	46 (85.19)	54	109 (14.49)	643 (85.51)	752

資料來源：主要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頁 1216；各期《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 35-46 冊）》核算編製而成，並參考各期《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 30-36 冊）》、《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等。

說明：教員含助手以上並包括兼任。

另外，林麗清也明白表示：

當時與日籍同學交往，大概僅止於淡如水之程度，表面上大家和好，但是日本人仍舊懷有優勢的殖民支配意識。譬如：在臺南白河實施野外演習結束當晚，日本教官和學生都會一起飲酒跳舞狂歡，並吆喝臺籍學生一同加入，假如不聽從就發火動怒；班會時，日本學生總會頭綁毛巾、跳上桌子手舞足蹈，唱起「替歌」，也硬要我們參與。還有，不陪他們踢足球，就嘲諷說「只會躲在家裡唸書，成績好有何用」等語；上軍事教練的課，臺籍學生負責揹重的機關槍，而日本學生只帶輕巧的槍械。

總之，凡事不順從日本人之意，他們就會表露出強烈不滿的情緒和言行態度。⁷⁵

關於此，1941年入學應用化學科的林耿清進一步指出，日籍學生心理尤其不平衡，因為他們畢業後必須當兵，而臺灣學生沒有兵役義務，因此有些日本學生會藉機毆打臺灣學生，出一時之氣，而臺灣人瞭解寡不敵眾的道理，只好忍耐專心於學業，以優異成績報一箭之仇。⁷⁶

由是觀之，種族歧視的不對等結構從入學延伸到在學的校園文化，臺日學生之間，殖民支配、被支配的族群對立意識猶然於弱肉強食的現實環境中流動。同時，造成彼此間的鴻溝與隔閡，除學業上的優劣表現外，⁷⁷ 尤其進入戰爭時期，兵役問題也成為主要的焦點之一。

(二)臺籍教師與學生互動及其人際關係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臺籍教師，從表三同樣可發現是極少數的族群，初期僅有林茂生1位教授，自中期起人數有略微增加，究其原因，乃部分傑出的臺籍畢業校友受校方重視，以及日本恩師推薦而回母校任教，加上戰爭時局多位年輕日本教職員被徵召赴戰場，以致身無兵役束縛的臺人有機會填補其職缺。如1934年3月首屆應用化學科畢業之賴再得提到，正值教員青黃不接之際，因過去研究經歷和教授之提拔，使臺南市土生土長的他好不容易才得到「教務囑託」的空缺，從此回到母校展開研究與教書的生涯。⁷⁸ 以下運用既有文獻資料，將臺籍教師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時代之簡歷，列表整理如表四，並舉例3位教師，理解其師生之間的互動關係。

⁷⁵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年6月6日，未刊稿。此處所謂的「替歌」（かえうた，亦稱わいか），係指沿用舊譜填新詞的歌，多屬滑稽庸俗的內容，戰前也曾流行於青年學生之間。

⁷⁶ 林耿清，〈五十餘年的回憶〉，頁101。

⁷⁷ 有關學業成績優劣，雖然難以判別，但若觀察升級和留級人數，或許多少可以窺知端倪。統計自1931年至1937年間，扣除中途退學或死亡者，全校共計1282人，其中臺籍學生升級者328人、留級者14人；日籍學生升級者875人、留級者65人。以上資料依據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30昭和六年度-第36昭和十二年度（1933-1940）。

⁷⁸ 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頁28。所謂「囑託」係指學校機關內編制外的約僱人員，職級相當於我國大專院校之助教；若編制內的助教，則日人稱之為「助手」。

表四：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臺籍教師在校簡歷

姓名	職位異動	任職前學經歷
林茂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31.4/23 共通學科教授兼圖書課長 • 1941.9/12 兼編修課長 • 1941.9/27 陸敘高等官二等 • 1941.9/29 依願免官 • 1941.10/1 講師（兼任教授）任編修課員 • 1941.12/2 敘勳四等授瑞寶章 • 1943.12/30 離校就任皇民奉公會中央本部國民動員部長，教職員互助團體「庚午會」舉行送別會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 •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高等官三等從五位）
賴再得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39 應用化學科教務囑託 • 1940.5/4 電氣化學科助教授 	本校應用化學科畢業（1931.4月～1934.3月）
陳發清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0.5月應用化學科講師 • 1940.8/20 應用化學科助教授 • 1945.5/11 轉任臺北帝國大學助手 	本校應用化學科畢業（1933.4月～1936.3月）
潘貫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0 電氣化學科講師 • 1942.1/29 電氣化學科教授（敘高等官七等） • 1942.3/3 敘從七位 • 1944.2/1 敘正七位 	臺北帝國大學理農學部化學科畢業
楊文明 (丸山文明)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2.3/25 機械工學科助教授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本校機械工學科畢業（1931.4月～1934.3月） • 臺南州立臺南專修工業學校教諭
陳春錦 (勝田秀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3.1/6 機械工學科教務囑託 • 1944.1/20 機械工學科助教授 	本校機械工學科畢業（1940.4月～1942.9月）
李舉賢 (倉田賢治)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3.3/19 電氣工學科講師 • 1943.4/26 電氣工學科教授（敘高等官七等） • 1943.6/15 敘從七位 	日本東北帝國大學畢業
孫炳輝 (中里輝雄)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1943.10/25 電氣工學科講師 • 1944.8/23 電氣工學科教授（敘高等官七等） • 1944.10/2 敘從七位 	日本九州帝國大學畢業

資料來源：整理自《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建校六十週年紀念》；《成大機械系七十年史（1931-2001）》；《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279-288 職員辭令；各期《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各期《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等。
說明：僅擔任囑託、助手者不列入本表。

由本表可知，如賴再得、陳發清、楊文明、陳春錦等 4 位皆畢業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幸得母校及恩師青睞而返校執教鞭，且和其他多位臺籍教師境遇相近，約莫於戰雲密佈之 1940 年代覓得正式教職。而這批臺籍菁英，在戰後或留任本校或北上進入國立臺灣大學，⁷⁹ 繼續發揮所長，春風化雨，作育英才。

⁷⁹ 留任原校有：賴再得、楊文明、陳春錦、李舉賢、孫炳輝；轉任國立臺灣大學者，除陳發清已於戰前調任外，戰後則有林茂生、潘貫，而李舉賢亦於二二八事件後轉任臺大。

1. 林茂生

林茂生是早期唯一的臺籍教授，講授德語和英語，並兼任圖書課長，籌畫管理圖書館業務。據林耿清回憶，林茂生的德文課頗受學生歡迎，教學有內涵且富幽默感。⁸⁰ 入學首屆應用化學科，畢業後考進臺北帝國大學的劉盛烈提到，學習 2 年的德語，對於日後的科學研究受益無窮；同時，林茂生負責劉氏加入的足球社團，領導足球愛好者做課外運動，因此接觸機會較多，感覺很親近學生，其哲學背景也帶給學生不少的啟發。⁸¹

在日籍學生方面，對於林茂生才高八斗、學貫中西之涵養，足堪代表臺灣文化人的氣派威嚴，留下深刻印象。⁸² 1942 年就讀電氣化學科的山內信和，猶記得林茂生離校最後課堂的一席話：「任何語言都好，總之精通一個外國語言，就會改變世界觀」，讓他感觸良多。⁸³

德語、英語皆受林茂生教導的林麗清，有極為貼切的描述：

林老師平時穿著國民服，腳裹綁腿，經常面帶微笑。授課談諧有趣，教室總是座無虛席，門庭若市，連走廊也擠滿旁聽生，頗受學生愛戴。黑板寫的字非常漂亮，上課常要求學生起立，大聲朗讀德語給他聽，學生也時常請教他在國外留學的事情，林老師偶而也會補充講解哲學方面的課，甚至分析佛洛伊德的精神醫學。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次上課林老師將成語「泣面に蜂」(禍不單行)誤說成「泣蜂に面」，學生暗中偷笑，後來林老師發覺講錯，就自我強力辯駁說明兩者意義其實相同，之後自己也大聲笑起來。

當時師生關係和現在不同，除上課見面外，下課後並無交誼，互動交流機會極少。但經常看到林老師出現在圖書館，咬著煙斗和日本教職

⁸⁰ 林耿清，〈五十餘年的回憶〉，頁 101。

⁸¹ 劉盛烈，〈應化生活の一感想〉，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龍舌蘭》第 3 號（1937 年 3 月），頁 105；林忠勝，〈劉盛烈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5），頁 35、37。

⁸² 如：富永一郎，〈思い出あれこれ〉，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134；浜寿夫，〈昭和 18 年一入学生の回想〉，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243。

⁸³ 山內信和的發言，參見〈座談會：私の学生時代〉，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317。

員閒話家常，聽說許多日籍老師向他請益事情，看起來頗有人緣，深受日本教員景仰尊敬。

雖然林茂生是臺灣人，但他對所有臺日學生都是一視同仁，絲毫沒有差別態度。然而，日本學生對他仍懷有些許藐視的心態，嘴巴雖然不明講，可是日本學生總覺得為何要讓被殖民者的臺灣人來教育他們。⁸⁴

至於有關 1941 年林茂生的辭職，正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長由若槻道隆更換為佐久間巖的敏感時機，眾說紛紜，人言籍籍。當時一般臺灣人的普遍認知與說法，有傳聞本來繼任校長職位者非林茂生莫屬，因官方不願意起用臺籍人士，只好封任林氏為勅任官教授，而佐久間校長與林氏私交甚篤，乃懇切慰留林茂生繼續留校任教。⁸⁵ 又據聞林茂生因官階高於新校長佐久間，有違殖民體制遂被迫請辭，轉調為講師（兼任教授）。⁸⁶

但倘若深入詳查探究此些傳言真偽，首先無可否認的，臺灣人擔任官立高等教育機關校長，基本上是渺乎其微，何況若槻與佐久間均曾在日本桐生高等工業學校先後任教，這層關係加上官階，以及由校內直接晉升人事，本為合理的行政措施。其次，關於官階部分，創校初始，林茂生雖然一直是僅次於若槻校長之首席教授，唯 1938 至 1939 年間佐久間已高過林茂生，⁸⁷ 到 1941 年 7 月 1 日時點，佐久間官銜高等官二等二級、正五位勳四等，而林茂生則為高等官三等三級、從四位勳五等，⁸⁸ 顯然前述傳聞應與事實不符。這或許一般人仍停留於過去首席教授之想像，抑或基於臺人民族意識的心理反應，以致產生如此的認知與錯覺。

⁸⁴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 年 5 月 30 日、2008 年 6 月 6 日，未刊稿。

⁸⁵ 參見張厚基總編輯，〈長榮中學百年史〉，頁 273。

⁸⁶ 參見趙承琛，〈成功大學六十年的回憶〉，頁 99；王振華，〈悲情歲月〉，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51。另外，王振華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王振華先生訪談紀錄〉，2004 年 6 月 14 日，未刊稿。

⁸⁷ 佐久間於 1938 年 9 月 30 日以高等官三等下賜二級俸，同年 12 月 26 日封勅任官待遇，1939 年 5 月 19 日敘勳四等授瑞寶章，參考〈佐久間巖（兼任臺南高工教授；三等）內佐久間之履歷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 16 年（1941）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 10115，文號 47。另外，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 14 年 7 月 1 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39 年 10 月），頁 393。當時佐久間官階為高等官三等二級勅任待遇、正五位勳四等；林茂生則是三等四級、正五位勳五等。

⁸⁸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 16 年 7 月 1 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1941 年 11 月），頁 351。

根據官方公文檔案顯示，1941年8月26日若槻依願退職，佐久間接掌校長職位，林茂生於同年9月6日提出退官辭呈，其理由為「個人因素之便」（一身上の都合により），繼之9月10日佐久間向總督呈遞職員退官之內申報告，並鑑於林氏在教育之辛勞與卓越表現，建請以勅任官待遇賜賞，而總督府乃援照所擬，於9月27日陞敘林氏為高等官二等，9月29日核准其退職，同時批示預定以講師聘任之。⁸⁹ 至於林氏所謂的「個人因素之便」為何，隱含著錯綜複雜的現實因素，缺乏相關佐證資料，實難速下斷言。然而，按其所書寫的〈掛冠有感〉詩：「天爵勝如人爵榮，峨冠掛卻一身輕；教鞭仍執書仍讀，且效愚誠盡育英」，⁹⁰ 當可感受體會到篤信基督教的林茂生，其辭官心境與奉獻教育之熱誠。

2. 賴再得

賴再得與成大淵源頗深，為該校首屆應用化學科畢業生，在1940年電氣化學科成立時，被聘升為該科之助教授。賴氏自述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擔任教職情形：日本學生非常頑皮，時常模仿我帶有臺灣口音的日本話作為談笑之材料，但我都會充分準備講義內容，並使用最標準的日語認真授課，終於贏得學生們的信任與好感。另外，賴再得提到皇民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承受來自社會及學校當局要求改姓名之壓力，最後巧妙地以「賴山陽也是日本人」，僥倖逃過難關。⁹¹

林麗清回憶說，賴老師照顧學生不分臺人日人，但日本學生不太尊敬他，因「賴」和「癩」日語同音，於是取「レプラ」（Lepra，癩病）的綽號稱呼，多少語帶輕蔑之意，賴老師自己也知道，卻莫可奈何。⁹² 林耿清也指出日籍學生看不起賴老師，且上課不認真，與臺籍學生尊師態度大相逕庭。⁹³

3. 潘貫

潘貫是臺北帝國大學畢業的臺南市人，林麗清敬佩潘教授勤奮好學，甚至過

⁸⁹ 〈林茂生（陞等；依願免本官；賞與）〉，〈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16年（1941）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114，文號61。

⁹⁰ 摘錄自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151。

⁹¹ 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頁28。

⁹²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年6月6日，未刊稿。

⁹³ 林耿清，〈五十餘年的回憶〉，頁102。

年也來學校作研究。⁹⁴ 林耿清敘述其課程進度快速，內容艱深，不如林茂生老師那樣輕鬆愉快，令他們自始至終感覺既新奇又緊張。⁹⁵ 有時學生絞盡腦汁，設想許多難題發問，潘貫卻都能立刻迎刃而解，讓學生驚嘆宛如活字典一般。⁹⁶ 由於潘貫飽學淵博，尤其對稀有元素頗有涉獵研究，⁹⁷ 當時在課堂上已講解「原子核在狹窄空間分裂，其爆發能量巨大驚人」，潘氏學理果真不幸而言中，1943年第二屆電氣化學科畢業的岡部元雄，就親眼目睹1945年8月6日的廣島原子彈爆炸，令他想起潘老師的授課，頓時恐懼和回憶交織，不禁感慨萬千。⁹⁸

(三)日籍教師與學生互動及其人際關係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創設初期，因是臺灣第一所高等工業教育機關，工業方面專業師資尤需仰賴日本國內，因此與內地之間產生了極為密切的師資交流現象。⁹⁹ 綜觀瀏覽諸多畢業校友的懷舊文章，對於母校擁有優良師資並得以受教而深感自豪與慶幸之描述，可謂屢見不鮮，一如恆河沙數。林麗清就坦言：本校創立目的是在配合南進政策，因此當時自日本延聘來臺的教員均是一時之選，今日成功大學能有如此卓越的發展，老實說都是戰前這批日籍教師奠定的堅實基礎。¹⁰⁰ 以下列舉2位教師之個案，透過當年學生的回憶紀錄及口述歷史，來瞭解校園內的師生互動關係。

1.佐久間巖

佐久間為應用化學科首任科長，並於1941年8月26日接掌第二任校長，至1944年3月30日辭官，前後凡14年餘，可說見證了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絕大部分的歷史。佐久間治學素以外國文獻之引用與介紹著名，大量蒐集並教授學生文獻方法，向來頗為自豪。¹⁰¹ 經常舉「不要看到引用文獻註明 Ibid，就跑去圖書館

⁹⁴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年6月6日，未刊稿。

⁹⁵ 林耿清，〈五十餘年的回憶〉，頁102。

⁹⁶ 岩本正晴的發言，參見〈座談會：私の学生時代〉，頁316。

⁹⁷ 參見〈兵器と稀元素：潘臺南工專教授に聴く〉，《臺灣新報》，1944年5月28日，第3版。

⁹⁸ 岡部元雄，〈潘貫先生の思い出〉，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95-96。

⁹⁹ 參見林孟欣，〈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頁236-239。

¹⁰⁰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年5月30日，未刊稿。

¹⁰¹ 參見前田一夫，〈回想〉，頁73；小倉勇，〈佐久間先生を介して開校當時を偲ぶ〉，收於台南高等

找 Ibid 名字的雜誌而鬧笑話」之實例，教誨學子引以為戒。¹⁰² 1941 年入學電氣工學科的池上博行，憶及當年在臺南一中畢業前夕，因風聞佐久間甚至將床鋪搬進研究室，以校為家之研究精神，於是決定報考理工科系。¹⁰³ 如此勤勉鑽研而馳名校外之佐久間，相反地，在學校師生眼中卻有另一面頗具爭議的評價，可謂褒貶不一、毀譽參半。

劉盛烈描述佐久間性格非常特殊，常自相矛盾而不知，且是非不明。例如：同學林錫坤向佐久間告狀有人考試作弊，卻被指責不合群；課堂傳授謬論的「出世學」，謂：畢業後就業絕對不可請假，縱使雙親往生也不要請假奔喪，如此力爭上游方能早日出人頭地，地下父母有知，必然高興；又說：受高等教育的臺灣人都是富有家庭子弟，不需代為安排工作，而日本人財產皆由長男繼承，其二男、三男則非就業不可等等，諸如此類情事，令劉氏相當不以為然。¹⁰⁴

劉盛烈於 1934 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後考進臺北帝國大學，之後並留在臺北帝大作研究。當佐久間繼任校長之際，佐久間曾在報紙發表「時局冀望天才」的教育論，強調今日的專門學校教育應重質不重量，宣言將施行菁英式的秀才教育。¹⁰⁵ 此論調引起劉氏憂慮不安，遂投稿《龍舌蘭》駁斥其說，並主張人品教育更甚於秀才教育，結果遭致佐久間不滿與責備，且牽累當時負責編輯刊物的臺南高工時代同學賴再得，最後被迫由賴氏代為修改文章而勉強收場。¹⁰⁶

其次，1941 年就讀電氣化學科的王文濱回憶，佐久間的課程聽之津津有味，學生莫不肅然敬佩，其偉大的奮鬥努力家形象，也令學生尊重；然而行為稍顯特異，致使獲得奇人之綽號。¹⁰⁷ 同樣說法亦見於日籍學生的回顧文章中，根據 1931

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84-85；福原節雄，〈すぐれた先生がためにめぐまれた私〉，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17。

¹⁰² 王文濱，〈憶念在母校求學時代之往事〉，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49；只野泉，〈“Ibid”とは？〉，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192-193；加藤照夫，〈一筆啟上〉，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346。

¹⁰³ 池上博行，〈台南高工と私〉，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137。

¹⁰⁴ 林忠勝，《劉盛烈回憶錄》，頁 35-36、40。

¹⁰⁵ 〈時局は天才を要望：佐久間新任臺南高工校長の談〉，《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8 月 27 日，第 3 版。

¹⁰⁶ 劉盛烈，〈人文自然相輔發展，共迎太平洋時代〉，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38；林忠勝，《劉盛烈回憶錄》，頁 39-40。此外，劉盛烈也曾於《龍舌蘭》（第 3 號）撰述佐久間授課的有機化學無開設實驗課程，深感此為應化生之恥，且和作為油脂化學泰斗之佐久間博士擔任科長一事相對照，顯得有點諷刺，參見劉盛烈，〈應化生活の一感想〉，頁 106。

¹⁰⁷ 王文濱，〈憶念在母校求學時代之往事〉，頁 49。

年入學首屆應用化學科的小倉勇詳述，佐久間犧牲假日，從早到晚埋首於實驗和文獻，感佩其勤奮研究之餘，但對於幾近患病似的潔癖習性，卻不敢恭維。因正逢長年流行赤痢、傷寒，以致凡物皆須消毒，蛋糕、羊羹等若無燒烤絕不食用，其怪人奇行，非僅止神經質，可說已達病入膏肓之地步。¹⁰⁸ 又，1935 年就讀應用化學科的福原節雄略謂：佐久間奇行聞名，但研究出色非凡；¹⁰⁹ 同屆同學富永一郎亦曰：講課脫軌離題、獨特之行事風格、勤於消毒等，留下深刻印象。¹¹⁰

1939 年入學之加藤照夫敘述佐久間極度潔癖，傳聞金錢使用前必先消毒，此事後來加藤確實親身體驗，就是在內地畢業旅行時，因佐久間嫌錢骯髒，乃令加藤代為保管錢包，並代替他付錢。¹¹¹ 事實上，1934 年的《龍舌蘭》已披露佐久間罹患神經衰弱，不得已將夫人送回內地安頓之訊息。¹¹² 要之，佐久間的潔癖習慣、神經質特性，以及奇異行為，在學校已是眾人皆知的公開事實。

除此之外，佐久間直言不諱的率直個性也招致眾多非議。1942 年進入應用化學科就讀的小森敏孝指出，開學典禮上佐久間校長當場明言「這個戰爭，日本勢必戰敗」而引起眾怒一事，始終無法忘懷，¹¹³ 其快人快語的坦率性格可見一斑。賴再得也提到，佐久間不善於用人，衝口而出，且剛愎自用，上任校長不久便四面楚歌。¹¹⁴ 林麗清對於佐久間則更有一段如下具體的描述：

佐久間是油脂化學的權威，但脾氣不好，專制且容易動怒。在某次的全校動員大會上曾說：「蔣介石比拿破崙還要偉大」，語出驚人，當場引起日本教授及教官等在校日本人士極大的反感和憤怒。其絲毫不忌諱、心直口快之個性，從他接掌校長職位後，校內已逐漸形成一股反對勢力。

另外，佐久間有點神經質又具潔癖，奉茶時絕不可碰觸杯口，否則必不飲用，恐有細菌沾染。所有物品均要求消毒，連新買的鞋子也要助

¹⁰⁸ 小倉勇，〈佐久間先生を介して開校當時を偲ぶ〉，頁 83。

¹⁰⁹ 福原節雄，〈すぐれた先生がたにめぐまれた私〉，頁 18。

¹¹⁰ 富永一郎，〈思い出あれこれ〉，頁 133-134。

¹¹¹ 加藤照夫的發言，參見〈座談会：私の学生時代〉，頁 315-316。

¹¹² 〈龍舌蘭スケッチ：尊い妻君〉，收於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龍舌蘭》第 1 號（1934 年 12 月），頁 81-82。

¹¹³ 小森敏孝的發言，參見〈座談会：私の学生時代〉，頁 314-315。

¹¹⁴ 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頁 28。

手袖山京幫他浸泡消毒水後才敢穿。由於袖山助手非常瞭解佐久間的生活習慣與個性，照顧無微不至，深獲信任，佐久間甚至將袖山職務由應用化學科調至校長室，且為她另設實驗室，因此校內開始出現不利於兩人的謠傳。

可是，若不問其特異性格，佐久間仍不失為一位好老師，對待學生無分臺人日人，均一視同仁，無寧說反而較關照臺籍學生，像第3期的陳發清就是他的得意門生，嗣後也提拔他回校任教。¹¹⁵

1945年末屆入學的王振華，從學長前輩口中聽聞佐久間甚有潔癖，但平時熱衷研究，也不會輕視臺灣人，且提攜賴再得、陳發清等臺籍教師，是位不可多得的好校長。至於有關袖山京助手，據傳長年照顧佐久間而深得信賴，在校內亦頗具發言權。¹¹⁶ 總之，概觀上述諸多回顧紀錄可知，佐久間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實為評價兩極的爭議性人物。

2. 宮本清利

宮本清利於1931年4月14日先擔任應用化學科囑託講師，並兼任學校瓦斯主任，負責規劃全校官舍瓦斯供應之業務，翌年4月3日升任教授，1941年9月12日轉任電氣化學科，1942年4月1日轉調至高雄州立高雄工業學校任職首任校長。¹¹⁷ 在校史檔案中，可發現宮本帶領學生至工廠見習參觀或內地畢業旅

¹¹⁵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4年5月19日、2004年6月6日，以及2008年5月30日、2008年6月6日，未刊稿。另外，有關袖山京在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資歷，於《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14年7月1日現在）》已列名囑託，1943年10月18日正式成為編制內的助手，1944年4月11日辭職離校。以上參見臺灣總督府編，《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昭和14年7月1日現在）》，頁394；《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昭和十五年度》，頁103；《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93、99。

¹¹⁶ 王振華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王振華先生訪談紀錄〉，2004年5月19日、2004年6月14日，未刊稿。另外，有關袖山京助手在校內深具影響力，亦可參見當時在應用化學科任教之千手諒一教授的說法，千手諒一，〈C13の会報發行に寄せて〉，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報：第33号》（横浜：該會，1989），頁12。

¹¹⁷ 參考〈宮本清利（任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內宮本之履歷書，〈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昭和7年（1932）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70，文號2；《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10、71、79；買月馨主編，《歌我雄工：雄工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專刊》（高雄：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2002），頁14、211。

行，¹¹⁸ 而過去既是學生，日後又成為學校同事之賴再得，對於宮本的授課內容及學術研究，也賦予高度之評價。¹¹⁹

另外，有關宮本之人際關係，藉由林麗清的口述訪談，發現尚有鮮為人知的一面。林氏說明：

1944年9月我從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畢業，幸得宮本校長薦舉而至高雄工業學校任教，一直到1945年戰爭最末期，因空襲導致學校被迫停課為止，期間與宮本有段相當頻繁的接觸經驗。由於同屬臺南高工淵源，經常談及昔日在校往事，發覺宮本和佐久間關係不佳，平素就意見相左而激烈對立，當時在學校最反對佐久間的就是宮本，以致宮本被迫離開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轉調至雄工，宮本對佐久間懷恨在心，在雄工時常在我面前批評佐久間過去的不是，講他的壞話，也包括和袖山京的一些傳言。

基本上，宮本不會鄙視臺灣人，像我就很慶幸能獲得賞識，在戰況如此吃緊的那個年代找到教職的工作。日治時期，臺灣人能在實業學校擔任教員本來就不容易，況且當時在雄工只有我一位臺籍教師。¹²⁰

綜觀本節的論述與探討，在不對等教育結構下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園文化，師生之間呈現微妙的人際關係。首先，在學生族群方面，透過入學機制所形成的弱肉強食世界，少數的臺籍學生明顯感受到來自日籍同儕之種族歧視，族群意識對立濃厚。其次，在教師族群方面，顯示臺籍人士能獲聘教職，不僅是個人學術優異表現，同時也拜戰爭時勢所賜，使無兵役義務之臺人有向上流動之機會，其中甚至不乏出身母校的臺籍畢業生，由此亦可窺知日籍教師關愛之師長情誼。除此之外，在校務發展的後期，日籍教師族群本身內部，因佐久間個性與行事風格，逐漸形成如宮本或其他日人等校內反對勢力，呈現「茶壺內風暴」之緊張態勢。

¹¹⁸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頁16、68。

¹¹⁹ 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頁27。

¹²⁰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8年5月30日、2008年6月6日，未刊稿。

再則，關於師生互動方面，無論臺日教師對待所有學生皆抱持一視同仁的態度，唯日本學生對臺籍教師仍存有輕視、不服氣之支配者意識，而臺籍學生則顯然感受不到教師的種族差別待遇，甚至對日籍教師懷有好感者亦大有人在。1933年入學機械工學科之莊君地，述及當時臺人子弟雖少，但受到日本教師諄諄教誨，並無差別待遇之感；¹²¹ 林苑明也表示師生之間相處融洽，毫無隔閡。¹²²

六、結論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的成立，是臺灣邁入 1930 年代由農業向工業轉化，以及強調海外擴張南進論的產物，¹²³ 也是總督府最後創辦之官立高等專門教育機構。由殖民教育體制觀之，創設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不僅擴充了專門教育領域，提升工業職業教育層級，也為日後的臺北帝國大學工學部，鋪陳了一條銜接的升學道路，建構完整的工業教育體系。然而，從日治教育史的宏觀角度考察，歷經兩次臺灣教育令之頒訂和修正，形成了日本人獨佔之族群不相對等的教育結構，同時也構築了臺人難以擠身跨越的入學窄門及高牆。基本上，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在此同一歷史脈絡中成立發展，這種情形由本文相關統計資料分析、時人追憶文章，乃至於口述訪談紀錄等，均可洞悉真貌。

構成臺籍學生入學窄門，從本文討論得知有四項要因：一、受制於掌管學校主事者之教育理念，以及校內多數日籍教師主導錄取判定與否；二、日語是臺灣學生升學面臨的最大障礙，以致居於語言劣勢的臺人始終無法公平享有與日人同等的就學機會；三、形式上的考試制度背後，隱藏著金科玉律般的臺人入學比率限制規定，且透過人為操控，達到抑制臺人升學之目的；四、藉由內地招考方式，強化日籍學生優勢的支配地位，以排擠臺灣人入學。

另外，在不對等教育結構下，經入學機制所形成之校園生態文化，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呈現複雜的族群意識與人際關係。族群對立意識儼然在日臺學生之間流

¹²¹ 莊君地，〈同心協力，繼往開來〉，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33。

¹²² 林苑明，〈為母校創校六十週年紀念而作〉，頁 44。

¹²³ 有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設立與臺灣產業發展關係之論述，參見高淑媛，〈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頁 245-247。

動，恰如殖民社會之縮影。但相對地，在師生關係之互動方面，臺日教師對待所有臺日學生一視同仁，同施情誼，臺籍學生也明顯體驗不到日籍教師的差別歧視，尚且提攜後進，讓臺灣人有登擢竄升之機會，顯然教育者精神已超越了種族的藩籬界限。如是觀之，日治時期的臺灣人面對殖民教育體制的升學之路，在族群不對等教育結構的宰制下，偏頗不公的差別待遇感受深切，唯通過窄門之後的在學生活，種族歧視在師生之間反而淡薄，甚至亦見感念師恩之情。如此的教育經驗，在瀏覽耳聞諸多日治時期臺灣人的回顧中，也是經常可尋覓發現的歷史共同記憶。

最後，補充略談 1944 年臺南高等工業學校發生之招生考試疑雲事件，此事當時引起校內騷動與對立，也導致「茶壺內風暴」潰堤，校長佐久間因而請辭下台，並連帶牽累含袖山京等部分教職員隨後辭職離校。關於事件始末，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有云校長涉嫌舞弊；¹²⁴ 亦有言校長錄取臺人過多，違反總督府政策，¹²⁵ 甚至牽扯到長榮中學校，¹²⁶ 致使事情發展魚龍曼衍，撲朔迷離。本文在此暫不釐清該事件真相，只是以當時一般臺人的解讀，傾向佐久間有意撤除或緩和臺籍學生入學限制而觸犯臺灣總督府奉為圭臬的殖民政策規定，¹²⁷ 由此可理解，處在殖民體制下的臺灣人面對差別和歧視之入學窄門，普遍反映出一種被壓迫的集體意識。誠如當年臺南二中學生張昭雄所述：「美其名為一視同仁，實際上毫無平等，我們臺南二中臺灣學生瞧不起臺南高工日籍學生，主要是因為他們沒有實力，卻只因為是日本人，就可以輕易考取。對於臺灣人而言，專門學校或高等學校等上級學校的升學之路確實是窄門，這是作為殖民地臺灣的宿命，唯有悲哀，別無他途」，¹²⁸ 這或許也一語道出臺灣人共同的歷史心境。

¹²⁴ 如：賴再得，〈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頁 28-29；林忠勝，〈劉盛烈回憶錄〉，頁 40。

¹²⁵ 如：陳祖甸，〈跨越朝代的學生回憶〉，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頁 100；葉來興口述，高淑媛訪問記錄，〈1944 年入學台日籍學生比例風波〉，頁 36；李石龍，〈化工系裡辛勤的園丁，半世紀來以校為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14。

¹²⁶ 參見張厚基總編輯，〈長榮中學百年史〉，頁 271-273。

¹²⁷ 所澤潤，〈戰時體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頁 266-267。

¹²⁸ 張昭雄，〈大喧嘩〉，收於《竹園慕情》（前州立台南二中第 19 期畢業生文集）創刊號（1997 年 8 月），頁 28。

引用書目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32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070，文號2。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4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114，文號61。
-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1941年，高等官進退原議，冊號10115，文號47。
-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9年3月8日，第5版。
-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一覽》，昭和五年度。臺北：臺灣總督府臺北高等商業學校。
- 《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28日，第5版；1928年12月14日，第2版；1928年12月15日，第5版；1928年12月18日，第5版；1928年12月25日，第5版；1931年1月17日，第7版；1931年3月5日，第2版；1941年8月27日，第3版。
- 《臺灣民報》，1929年6月16日，第2版。
- 《臺灣時報》1926年9月號、10月號；1927年1月號、11月號、12月號；1931年6月號。
- 《臺灣新民報》，1931年1月17日，第2版；1932年4月2日，第14版。
- 《臺灣新報》，1944年5月28日，第3版。
- 《臺灣總督府及所屬官署職員錄》，1931年8月1日現在-1944年1月1日現在。臺北：臺灣時報發行所。
- 《臺灣總督府官報》，1942年-1944年。
- 《臺灣總督府府報》，1931年-1942年。
- 《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30-46冊。臺北：臺灣總督府民政部文書課。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一覽》，各期。臺南：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
- 《臺灣總督府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沿革誌》。
- 《臺灣總督府學事年報》，第30-36。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
- 《龍舌蘭》，各期。臺南：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校友會。
- 王振華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王振華先生訪談紀錄〉，2004年5月19日、2004年6月14日，未刊稿。
- 林麗清口述，王耀德採訪整理，〈林麗清先生訪談紀錄〉，2004年5月19日、2004年6月6日，以及2008年5月30日、2008年6月6日，未刊稿。
- 千手諒一
- 1989 〈C13の会報発行に寄せて〉，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鳳木会会報：第33号》，頁12。横浜：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
- 小倉勇
- 1981 〈佐久間先生を介して開校当時を偲ぶ〉，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台南高等工業学校五十年の歩み》，頁83-85。東京：開校5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 山内信和等
- 1991 〈座談会：私の学生時代〉，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鳳木会会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横浜：開校6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 川合章、安川寿之輔、森川輝紀、川口幸宏（合著）
- 1984 《日本現代教育史》。東京：新日本出版社。

川村竹治

1930 《臺灣の一年》。東京：時事研究會。

文部省內教育史編纂會（編修）

1941 《明治以降教育制度發達史》，第 11 卷。東京：龍吟社。

王文濱

1991 〈憶念在母校求學時代之往事〉，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4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王振華

1994 〈悲情歲月〉，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5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王健文

2002 〈前世今生：關於成功大學的歷史記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04-20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王耀德

1996 〈教育制度〉，收於張隆義主編，《日本》，頁 330。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加藤照夫

1991 〈一筆啟上〉，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346。橫濱：開校 6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古澤勝之

1934 〈祝辭〉，《龍舌蘭》開校祝賀式記念號: 15。

只野泉

1981 〈“Ibid”とは？〉，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192-193。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

1981 《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1991 《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橫濱：開校 6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1996 《鳳木會名簿：1996 年版》。千葉：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

矢內原忠雄

1988 《帝國主義下の台灣》。東京：岩波書店。

石萬壽（主纂）

1991 《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稿：建校六十週年紀念》。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吉野秀公

1927 《臺灣教育史》。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

池上博行

1981 〈台南高工と私〉，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137。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佐藤源治

1943 《臺灣教育の進展》。臺北：臺灣出版文化株式會社。

吳文星

2008 《日治時期臺灣的社會領導階層》。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呂興昌（編纂）

1976 《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紀要初編（1946-197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李石龍

1994 〈化工系裡辛勤的園丁，半世紀來以校為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14。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李金振（主編）

1991 《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李園會

2005 《日據時期臺灣教育史》。臺北：國立編譯館。

汪知亭

1978 《臺灣教育史料新編》。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里見文義

1991 〈凡愚のたわごと〉，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鳳木会会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117。横浜：開校 6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会。

岡部元雄

1981 〈潘貫先生の想い出〉，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台南高等工業学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95-96。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会。

所澤潤

2002 〈戰時体制と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国立成功大学の基盤形成の一側面〉，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61-285。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林孟欣

2002 〈日治時期的臺南高等工業學校〉，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229-244。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林忠勝

2005 《劉盛烈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林苑明

1991 〈為母校創校六十週年紀念而作〉，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44。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林耿清

1994 〈五十餘年的回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101-10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前田一夫

1981 〈回想〉，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台南高等工業学校五十年の歩み》，頁 72-73。東京：開校 5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会。

洪郁如

2008 〈女子高等教育の植民地的展開：私立台北女子高等学院を中心に〉，收於香川せつ子、河村貞枝編，《女性と高等教育：機会拡張と社会的相克》，頁 84-113。京都：昭和堂。

若槻道隆

1927 〈臺灣の教育に就て〉，《臺灣時報》1927年1月號，頁19-20。

1931 〈臺南高等工業學校の開校に當りて〉，《臺灣時報》1931年6月號，頁1-2。

浜寿夫

1991 〈昭和18年一入学生の回想〉，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243。橫濱：開校60週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高淑媛

2002 〈日治時期臺南高等工業學校和臺灣工業化〉，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編，《成功的道路：第一屆成功大學校史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245-25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

1994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四十年專輯小組（主編）

1986 《成大四十年：回顧與前瞻》。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著）

2001 《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張厚基（總編輯）

1991 《長榮中學百年史》。臺南：私立長榮高級中學。

張昭雄

1997 〈大喧嘩〉，《竹園慕情》（前州立台南二中第19期畢業生文集）1: 28。

莊君地

1991 〈同心協力，繼往開來〉，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33。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許炳楠（口述）、劉秉恆（整理）

1991 〈禮義廉恥與新速實簡〉，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53。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紀錄）

2002 〈陳永祥先生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訪問、許雪姬等紀錄，《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人》，頁487。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祖甸

1991 〈跨越朝代的學生回憶〉，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100。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富永一郎

1991 〈思い出あれこれ〉，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同窓會，《鳳木會會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133-134。橫濱：開校60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會。

買月馨（主編）

2002 《歌我雄工：雄工創校六十週年紀念專刊》。高雄：高雄市立高雄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葉來興（口述）、高淑媛（訪問記錄）

2001 〈1944年入學台日籍學生比例風波〉，收於國立成功大學校史編纂小組編著，《世紀回眸：成功大學的歷史》，頁36。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葉萬發

- 1991 〈走過烽火，樂在服務〉，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39。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福原節雄

- 1991 〈すぐれた先生がたにめぐまれた私〉，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鳳木会会報特別号：六十周年記念》，頁 17-18。横浜：開校 60 周年記念事業企画委員会。

臺灣省立工學院（編）

- 1955 《臺灣省立工學院概況》。臺南：臺灣省立工學院。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編製）

- 1946 《臺灣省五十一年來統計提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統計室。

臺灣教育會（編）

- 1939 《臺灣教育沿革誌》。臺北：臺灣教育會。

趙承琛

- 1994 〈成功大學六十年的回憶〉，收於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編，《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系史稿》，頁 9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

劉盛烈

- 1937 〈應化生活の一感想〉，《龍舌蘭》3: 105-106。
1991 〈人文自然相輔發展，共迎太平洋時代〉，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38。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增田昌俊

- 1999 〈昭和 18 年春の想出〉，收於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鳳木会会報：第 54 号》，頁 13。横浜：台南高等工業学校同窓会。

鄧凱雄

- 1991 〈治瘡疾生吞海蟑螂，救同學問罪憲兵隊〉，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104。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賴再得

- 1991 〈悠悠六十載，點滴在心頭〉，收於李金振主編，《成大六十年：建校六十週年紀念特刊》，頁 26-29。臺南：國立成功大學。

謝春木

- 1930 《臺灣人は斯く観る》。臺北：臺灣民報社。

謝爾昌（編）

- 1997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史：成大機械系六十年史（1931-199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2003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系史：成大機械系七十年史（1931-2001）》。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

Tsurumi, E. Patricia

- 1977 *Japanese Colonial Education in Taiwan, 1895-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ssue of Admissions to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Yao-te Wang

ABSTRACT

During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the way for Taiwanese to climb up the social ladder was through acquiring higher education. However, the 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was founded on racial discrimination rather than equality.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restricted admissions of Taiwanese to higher education to the minimum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educational privileges of the Japanese. Thus, Taiwanese students faced competitive entrance examinations to college for advancing their social status.

Through manipulating the admission mechanism, the Japanese deprived the Taiwanese of higher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With reference to the unique campus culture among the minority Taiwanes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of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college admissions of Taiwanese students, analyzed the college admission mechanism in Japanese colonial Taiwan, and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thnic consciousness and human relationship.

Keywords: Tainan Technical College, Ethnically Unequal Educational Structure, College Admission Mechanism, Ethnic Relations